

## 《本草经集注》对《神农本草经》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孙鑫 钱会南

**【摘要】**《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对中药理论的又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其在诸多方面对《神农本草经》所初步构建的中药理论体系进行了完善与创新。本文立足于《本草经集注》原文,从药物分类方法、药性配伍理论、药物采收炮制、剂量剂型、服药方案、编写体例等方面介绍《本草经集注》对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影响,说明其在中药理论体系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本草经集注》;《神农本草经》;中药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R28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6.12.013

《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是梁代著名医药家、文学家陶弘景所著<sup>[1]</sup>,是以《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草经》)为基础<sup>[2]</sup>,对晋以前名医记录进行整理和注释而成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众所周知,《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其所建立的中药理论体系是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集注》是继《本草经》之后,对中药理论的又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其在诸多方面对《本草经》所初步构建的中药理论体系进行了完善与创新。作者立足于《集注》原文,兹从以下几个方面将《集注》对《本草经》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逐一进行介绍。

## 1 载药数与中药分类法

### 1.1 倍增新药

据《本草经》序录所言,《本草经》共载“子母兄弟,根茎华实,草石骨肉”等各类药物共计 365 种,是东汉以前药物学知识的结晶。在此基础上,陶弘景在编撰《集注》时,先是对《本草经》所载 365 种药物逐一进行了整理和校订,后据魏、晋名医所记录和积累的药物经验,“精粗皆取”,补充了 365 种新药,使《集注》全书共载药计 730 种而“无复遗落”,比《本草经》药物数量增加了一倍之多。

### 1.2 首创两种中药分类法

《集注》不仅扩充了《本草经》的药物数量,还对《本草经》的药物分类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创新。《本草经》作为最

早的综合性本草著作,首次对中药进行了分类记载,是中药分类之嚆矢。其所采用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主要依据药物“益寿”“祛疾”的功效和毒性的强弱进行划分<sup>[3]</sup>,并简要说明了其分类原则和三品药性。在此基础上,陶弘景对三品分类原则做了进一步的解读,云:“上品药性,亦皆能遗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然而岁月常服,必获大益;中品药性,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这一阐发使三品分类的界定更趋合理。与此同时,针对当时不同版本《本草经》“草石不分、虫兽无辨”的混杂情况,陶弘景创造性地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了分类,依据药物本身的形态、属性等将药物划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有名无实七类,并以此七类为纲,每一类药物(除有名无实类)中又细分为上、中、下三品。这种以自然属性为一级分类、以三品药性为二级分类的药物分类法,既是对《本草经》分类法的继承,又是对传统三品分类法的突破,后被《新修本草》所承袭。陶弘景所创制的药物自然属性分类法是中药分类法的重大进步,开创了中国古代以药物基原为重点的药物分类标准,为其后历代具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的药物分类产生了巨大影响<sup>[4]</sup>。

此外,为便于临床用药者“赴急抄撮”,《集注》还开创了根据主治病证分类药物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陶弘景在继承《本草经》“大病之主”病证与药物相结合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详尽了病证名称,将其原有的 42 个病证增至 83 个,并以病证为纲,总结典型药物列于其所主病证之下,从而“以本性为根宗,然后配合诸证,以命药耳”。这种依据临床主治病证类别药物的方法,不仅是对药物分类法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它使医者临床用药时能够“按病索药”,从而更加高效地选药组方,为推动本草更加紧密地结合临床治疗提供了助力。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2013CB532001)

作者单位:1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孙鑫(博士研究生)、钱会南]

作者简介:孙鑫(1989-),2014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藏象理论的文献及实验研究。E-mail:bucmsunxin@163.com

通讯作者:钱会南(1955-),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藏象理论的文献及实验研究;中医疾病与体质相关理论及临床应用研究。E-mail:qhnan2013@sina.com

## 2 中药药性、配伍与毒性理论

### 2.1 进一步完善药性理论

有关中药药性,《集注》序录中对《本草经》原文注释道:“若冷热乖衷,真假非类,分两违外,汤丸尖度,当瘥反剧,以至陨命。”足见其对药性的重视。陶弘景在《集注》中总结提炼晋以前的医家记录,并结合民间实践与自身经验,对《本草经》中药物性能、形态等内容加以考证与勘误,并提出见解。其中,他尤为重视药物的寒热四性,并直言:“其甘苦之味可略,有毒无毒易知,唯冷热须明。”在《本草经》原有的“大热、温、微温、平、微寒、寒”六种药性基础上,又细分出“大温”“大寒”两性。还根据实际经验修订了《本草经》中某些药物的四性。如将丹参由“微寒”勘正为“性热”等。针对一药多种效,他提出应“取其偏长为本”,即使用其主要功效为主。同时,在根据病情和药性组方用药时,陶弘景认为还应考虑具体病人的性别、年龄、体质、情志、环境及风俗习惯等情况进行辨证施药。正如其在序录中所云:“复应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这种观点是对单纯根据病证属性辨证用药的充实发展,既是陶弘景道家思想的体现,也与“因人制宜”和“天人相应”的中医思想不谋而合<sup>[5]</sup>。

### 2.2 推动中药配伍理论发展

关于中药配伍,《本草经》阐发了“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两种固定药数的配伍组合。《集注》在注解此处时则有不同见解,认为“世道诸方,亦不必皆尔”“今和合之体,不必偏用”,进而提出“自随人患苦,参而共行”“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的观点,即不必拘泥于固定的药物比例,又应根据具体病证的属性和治疗原则,灵活组方用药。此外,《本草经》所论及的另一药物配伍理论——七情,陶弘景在《集注》中也有更深入详尽的诠释。其在《本草经》高度凝练的七情理论基础上,对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逐一进行详解和鉴别,以明晰世人对七情的概念,以便于配伍用药时善加利用。在此基础上,为解决“世人为方,皆多漏略”的情况,陶弘景在《集注》中设立“七情药例”专篇,对七情药对集中辑录,明确了 141 对药对配伍的优良利弊。虽然目前对于“七情药例”的来源与可应用性尚存在争议<sup>[6]</sup>,但这无疑是推动七情理论规范应用于实践的一次积极尝试<sup>[7]</sup>,对临床组方配伍中合理增效减毒具有指导作用。

### 2.3 具化中药毒性理论

药物毒性方面,《本草经》首次将“毒”的概念规范为药物的不良反应,明确地将中药毒性列入中药药性理论的范畴,还对有毒药物的服用方法加以说明<sup>[3]</sup>。《集注》遵循了《本草经》有关药物毒性的概念界定,进一步阐发了有毒药物的服用方法,并总结了药物解毒实例。对《本草经》所言“先起如黍粟,不去倍之”的有毒药物用法,《集注》则认为“毒中又有轻重,且如狼毒、钩吻,岂同附子、芫花辈耶”,因此提出“皆须量宜”的原则,即应根据药物毒性的不同,采用

不同容积的剂量标准。这种灵活的度量方法显然更贴合实际。更具实践意义的是,《集注》还创设了“解毒”专篇。该篇介绍了各类中毒的处理方法,包括解虫兽毒 5 条、解病邪毒 3 条、解药毒 25 条、解食物毒 7 条、解服药过剂闷乱 1 条,共 41 条<sup>[4]</sup>。这是本草中最早的“解毒”专篇,不仅有利于临床用药合理增效减毒提高疗效,还深刻影响了后世本草的编写体例。

## 3 中药采制与炮制

### 3.1 重视中药质量控制

《本草经》与《集注》均蕴含了浓厚的道家文化思想,二者都十分重视药物的生境产地与鉴别。早在《本草经》序录中便有“采治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的说法,并在各论证文中标明了绝大多数所载药物的生产环境<sup>[8]</sup>。《集注》继承并发扬了上述观点,认为药物的产地、采摘时节、成熟程度、形态真伪等药物性状均与疗效紧密相关,应纳入中药质量控制的范畴加以讨论并规范。陶弘景在《集注》中注释道:“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并做大段论述,注释古代地名,认为不重视药材产地是用药难以获得应有疗效的重要原因之一。陶弘景还在各论中为所载药物均“注铭世用土地”,介绍药物产地和生长环境。如蜀椒一条,陶弘景注明其“生武都川谷及巴郡”“出蜀郡北部,人家种之”的品质较好,而“江阳晋源及建平亦有而细赤,辛而不香,势力不如巴郡”。这种强调药物产地的观点,为后世重视“道地药材”提供了理论依据。标注药材主产地的编写体例也被后历代本草纷纷效仿,深刻影响了本草学编写规范。关于药物的采收,《集注》也详加说明,指出“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方可“势力淳浓”;且总结出“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其成熟”的经验。此外,陶弘景本身的道家背景,令其十分看中药物的“真伪好恶”。他批驳当时“众医睹不识药,唯听市人”的现状,提出药物品种、真伪鉴别的重要性,并在总论和各论具体药物中补充大量描述药物形态、相似品种的区别和鉴别要点的注释,开创了药物鉴定的先河<sup>[4]</sup>。以桑寄生为例,《本草经集注》载其“生树枝间,寄根在枝节之内,叶圆青赤,浓泽易折,傍自生枝节。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实赤,大如小豆”,对其生长位置、形状质地、乃至生长规律都有详实描述,为医家日常识别药材、鉴别用药提供了方法和依据。上述《集注》所载内容丰富了中药理论体系的内涵,无疑对提高药物质量、提升临床用药疗效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 3.2 完善中药炮制方法

药物炮制方面,《本草经》言药物有“阴干、暴干”等不同炮制方法,并在部分药物条目下做了简要标注,说明在秦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人为的加工同样可干预药物反映出的药性和功效。这一点在《集注》中得到充分重视,并对其进行了详细地总结、修订与完善。陶弘景在序录中设立“合药分剂料治法”专篇,首次将公元五世纪的炮制方法进行了总结,增补了许多修治、炮制技术,并论述了每种方法的作用,

不仅介绍了具体操作方法,还举例说明。专篇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炮制方法,包括:净制,如去皮、去毛、去心、去土等去除方法和洗法等清洁方法;切制,如将“咬咀”改为“细切”、剉、薄切、镑、捣等方法;炮炙,如“诸虫先微炙”、熬、烧、炮、炙、蒸、渍等方法,并介绍了炮炙所用的酒、醋、蜜等辅料。此外还载有曝干、烘干等干燥工艺<sup>[9]</sup>。更可贵的是,陶弘景在分论每条药物的注释中,增添了大量详实的、适用于该药的炮制方法,十分具体且具有针对性。这是医药文献中首次对中药炮制技术的原则和规律进行总结归纳,标志着全面而系统的中药炮制理论初步形成,丰富了中药理论体系,对保障药效、用药安全、便于制剂和调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4 剂量剂型与服药方案

##### 4.1 统一剂量剂型

《本草经》归纳了药物可有丸、散、水煮、酒渍、膏煎等基本剂型,明确指出应当根据药物性质选择剂型的观点,并在部分具体药物标明其适宜剂型。在此基础上,《集注》分别阐释了丸、散、膏、丹、汤、酒等不同剂型的概念、适用范围,并详细介绍了制作流程。如介绍丸药的筛制技术时,《集注》载:“凡筛丸、散药竟,皆更合于臼中,以杵研之数百过,视色理和同为佳。”这些详尽的介绍为药剂的生产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规范,其中的技术方法多为后世沿用和发展。

有关药物的剂量和计量单位,《本草经》原书中鲜有提及。《集注》则指出,用药时“分剂秤两,轻重多少,皆须甄别”,若“分两违舛”可导致“当瘥反剧”,甚至“以致殆命”,故其在序录中进行了补充阐述。其先是考证了古今药物计量的度量衡,进而对药物计量的分量标准进行了统一和细分,提出不同剂型应使用不同秤作量,如粉、散剂用刀圭量取等。

##### 4.2 规范服药方案

《本草经》在其序录中提出过一种较为朴素的服药方案,即根据病证所在的身体位置调整服药时间。可见古人已经意识到不同的服药方案对药物疗效能够造成影响。针对这一点,陶弘景在《集注》中也有所发挥。其创制“服药食忌例”专篇,介绍了半夏、茯苓、巴豆等 11 味药的服食禁忌。如“服药有巴豆,勿食芦笋羹及猪肉”等。其后还总结了 4 条通用的服药禁忌,如“服药,不可多食生胡蒜杂生菜”等。这是最早的见于本草专著中的服药禁忌专篇。《集注》另一服药方案的首创是设立了“药不宜入汤酒者”专篇。该篇列举了石类 17 味、草木类 48 味、虫兽类 29 味,共计 94 味不宜入汤酒的药物。以上专篇的首次出现,完善了中药理论体系框架的内容范畴,规范了药物服用方式,对临床用药具有指导意义。

#### 5 本草编写体例和文献学

值得一提的是,除对中药理论的发展,《集注》在本草编写体例和文献学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如前文所述,《集注》

是结合了《本草经》原文、晋以前名医记录、以及陶氏弘景自身经验观点编著而成。为保存各部分文献原貌,陶弘景采用了朱墨分书、大小字分录的撰写方法。其以朱字书写《本草经》原书内容,以墨字书写历代名医记录;大字抄录药条正文,小字注释自身经验见解。还结合药性内容,“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来标注药物寒热四性。一改当时本草抄本“三品混揉、冷热外错”的紊乱情况,还可有效区别文献出处。《本草经》年代久远原本已佚,今日得以存世也是有赖于《集注》这些开创性的工作<sup>[10]</sup>。以上编写体例上的创举,为后世本草的整理和撰写提供了范例,对保存古籍文献也极具意义。

#### 6 结语

作为《本草经》最具有影响力的注本之一,《集注》全面总结了公元五世纪前的中药学理论体系,继承了先贤的理论精华,且在药物分类方法、药性配伍理论、药物采收炮制、剂量剂型、服药方案等方面均有所补充和突破。相对于《本草经》,《集注》更加注重临床和民间生产经验的积累,其所载的丰富的用药经验更具临床实用性,许多内容流传至今仍为现代临床所参用,奠定了其在本草学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总观中药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集注》对中药理论的发展仍是在《本草经》所初步建立的中药理论体系框架基础之上的,二者可谓一脉相承。可以说,《集注》对中药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2] 尚志钧. 神农本草经校注[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 [3] 孙鑫,钱会南. 《神农本草经》中药理论体系框架研究(上)[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6):1871-1874.
- [4] 尚志钧. 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对本草学的贡献[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22(3):8-9.
- [5] 谢妹庄. 浅谈《本草经集注》对中药学发展的影响[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11(5):105-106.
- [6] 尚志钧. 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的考察[J]. 中国医药学报,1986,(2):40-41.
- [7] 王家葵,张瑞贤. 神农本草经研究[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8-100.
- [8] 孙鑫,钱会南. 《神农本草经》中药理论体系框架研究(下)[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6):2291-2294.
- [9] 关怀,王地,王敏,等. 古代中药炮制学史分期考[J]. 北京中医药,2009,28(8):629-631.
- [10] 柳长华,丁侃. 试论陶弘景对保存《神农本草经》原貌的贡献[J]. 环球中医药,2009,2(3):203-204,213.

(收稿日期:2016-03-21)

(本文编辑:韩虹娟)